

抗战舞蹈精神图谱的身体话语重构

——以《旗帜》为例

陆欣欣

[摘要] 抗战舞蹈的精神图谱在当代身体话语中的重构，其红色文化基因的历史脉络清晰可溯：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革命传统发轫，鲁艺精神在东北大地持续传承发展，形成抗战舞蹈精神图谱在沈阳音乐学院的延续轨迹。《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作品中的抗战舞蹈精神内核解析，为后续《旗帜》等作品筑牢了精神根基。舞蹈作品《旗帜》以当代身体语言重构抗战记忆，在动作编排与意象营造中，既留存“为人民而舞”的鲁艺精神底色，又融入现代舞台叙事逻辑。这种创作实践实现了对鲁艺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旗帜》以舞蹈激活红色历史的当代生命力，通过身体创新，让抗战精神成为滋养当代艺术创作的精神资源，为红色文艺在新时代的传承提供了实践范式。

[关键词] 鲁艺精神；《旗帜》；抗战舞蹈；红色传承

中图分类号：J7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4-0155-06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4.20

一、从鲁迅艺术学院到沈阳音乐学院：红色文艺基因的历史溯源

1938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议下，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专业艺术院校，其以“培养抗战文艺干部与文艺工作者”为宗旨，开创了“艺术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传统。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和推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同时指出了办学前期“关门提高”的教育方针。延安整风运动后，学院组织师生成立实践小分队，深入解放区、抗

战前线、敌占区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创作演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如王大化、李波表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等人集体创作的《惯匪周子山》，黄准创作的《拥军花鼓》，韩冰等人创作的《二流子变英雄》等，真正践行了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实践历程^[1]。

东北鲁艺时期（1945—1953年），师生们集体创作了一批以拥军、生产、翻身、锄奸惩恶等为主题的舞蹈作品。此间，吴晓邦积极投身紧张的教学工作和创作，先后复排了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两部舞蹈作品。1948年7月，为宣传大进军形势，吴晓邦、胡果刚排练了《进军舞》，该作品标志着我国部队舞蹈逐步走向正规化、专业化。同年11月，沈阳

作者简介：陆欣欣，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辽宁省文联系统文艺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作品（项目）（2024246）。

全境解放，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在沈阳恢复办学，并合并东北鲁艺四个文工团和音工团，重新组建为鲁迅艺术学院，学院下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舞蹈班等教学机构。舞蹈班师生创作了表现工人劳动的《锻工舞》、表现农业丰收的《农作舞》等优秀舞蹈作品。作为新中国首个舞蹈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舞蹈班肩负起培育新中国第一代舞蹈人才的时代重任。

1949年，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东北鲁迅艺术学院。1953年，该校以音乐部为基础成立东北音乐专科学校。1958年7月，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正式更名为沈阳音乐学院^[2]。学院继承鲁迅艺术学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赓续红色血脉，将东北地域的抗战记忆、民族情感融入舞蹈语汇，形成独树一帜的红色艺术谱系。中国舞蹈艺术先驱吴晓邦、盛婕、陈锦清等艺术家，将延安鲁艺的红色舞蹈火种传递到了东北；在他们的带领下，学院早期的舞蹈教育专家得到了红色舞蹈艺术的洗礼，自此开启新中国舞蹈艺术在东北地区的教育与传播，开创了辽沈大地乃至全国舞蹈教育的先河。学院自诞生起便肩负着双重使命：既以舞蹈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又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新舞蹈的发展路径。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站在历史与当代的交汇点，重新审视抗战时期的舞蹈创作特征，以及当代舞蹈作品《旗帜》如何以现代手法激活红色历史基因，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如何赓续红色血脉”这一时代命题的应答。

二、历史语境下的当代回响：《旗帜》对延安革命文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当代身体话语以身体为核心表达媒介，在当代舞蹈创作与实践要突破传统舞蹈语汇规范，不再局限于特定舞种的程式化动作，而是通过身体形态、运动轨迹、力量质感等元素的创新组合，构建具有时代性意义的表达体系。学院于2023年

创作的当代舞群舞作品《旗帜》，以纪念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5周年为契机，深入挖掘红色历史档案，走访抗联老战士与文艺史专家，以“红色旗帜的精神传承”为核心主题，融合现代舞、中国古典舞与军事舞蹈元素，通过21名舞者的肢体叙事，构建跨越80年的历史对话场域。编导采用“双旗帜意象”（破损的历史旗帜与当代的崭新旗帜）的舞台设计，结合动态影像与交响乐伴奏，形成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呈现方式，完成了对传统的三重突破。

（一）意象迭代：从“战斗道具”到“精神图腾”的符号升级

延安鲁艺时期的舞蹈作品，常常借助大刀、长矛等真实兵器及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将战斗与生活的气息直接融入艺术表达。《旗帜》在继承与创新中迈出独特一步，将旗帜从具体的“战斗旗帜”升华为抽象的“精神图腾”，构建“历史能指—当代所指”的转译机制，如将“破损旗帜”从战争符号转化为象征“韧性精神”的文化符号。从历史维度看，“破损旗帜”具有深刻的内涵，其巧妙承接了延安鲁艺时期舞蹈作品中“旗帜破损却不倒”的细节。以1943年的舞蹈作品《红旗不倒》为例，旗帜撕裂的动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旗帜》则在此基础上，借助现代舞独具的“肢体扭曲”和“静态定格”等表现手法，进一步放大了“纵然千疮百孔仍坚定挺立”的精神象征。舞者们通过身体的扭曲与伸展，展现了红旗于战火中历经的磨难，在静态定格的画面里，恰似时间停滞，让观众更深入地感悟到红旗承载的坚韧精神力量。编导以旗帜为桥梁，一面连接着1936年的林海雪原，一面通向2019年的阅兵场；一面是5人小队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一面是16人仪仗队用正步走出的底气。两面旗帜的对话，正是红色血脉中最鲜活的传承。

从当代呈现维度看，《旗帜》大胆地将中国古典舞“提沉”“展臂”技法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并配合LED灯光的动态渐变，使国旗在不同场景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质感。在两面旗帜的互动中借

助符号学层面的“能指扩张”，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藩篱。在不同历史时期，旗帜符号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这印证了红色文化的当代转化其本质是一场身体现象学的考古实践，只有让历史精神在当代舞者的身体话语中重新搏动，才能实现从“文化记忆”到“存在论传承”的本质性跨越，使抗战舞蹈的精神图腾成为永不褪色的印记。

（二）时空折叠：在身体记忆中打通历史与当代的对话通道

在当代红色舞蹈作品的创作中，如何突破程式化表达，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对话、情感的真实传递与价值的深度共鸣，是《旗帜》在创作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命题。其中，两面旗帜的相遇场景作为连接抗战记忆与当代传承的关键节点，通过细节设计的隐喻性与历史叙事的具象化，使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摆脱了刻意感，成为可感知的身体叙事。

两面旗帜的初次相遇，便以视觉与肢体的细节设计奠定“历史向当代传承，当代向历史致敬”的叙事基调。现代仪仗兵处于明亮聚光灯下，动作如钟表齿轮般精准划一，象征着新时代秩序与力量的稳定呈现；抗联战士隐于昏暗侧光中，姿态似风中残烛般顽强不屈，隐喻着战争年代的苦难与坚守。这种光影与动作质感的对比，在视觉层面构建起时空差异的张力。创作团队通过道具细节强化寓意，特意将“破损旗帜”的旗杆设计得比仪仗旗帜的旗杆矮一截，旨在以视觉差异为“传承”命题的具象化表达奠定根基，实现精神赓续，彰显当代的发展是对历史的延续与超越。

结尾段落的意象重构，是时空对话从情感共鸣升华为精神传承的意象呈现。参照东北抗联在“冰趟子战斗”中，战士们以身体搭建人墙保护旗的历史档案，《旗帜》代表作品创作出“托举高塔”造型：5名抗联战士被现代仪仗兵以叠罗汉方式托举至空中，残破旗帜在他们颤抖手中依旧挺立，其余仪仗兵则单膝跪地摇动崭新红旗的旗杆；鲜红的旗面舒展飘扬，新旧旗帜在同一时空下形成“历史仰望当代，当代承接历史”的视觉

闭环。托举的高度象征着历史精神的崇高性，摇动的幅度传递着当代传承的生命力，演员们泛红的眼眶、急促的呼吸、紧绷的肩颈肌肉，让抽象的使命交接成为了可感知的身体语言。饰演“老班长”角色的演员在采访中提到：“当站在高塔上看着下方崭新的旗帜时，指尖感受到布料的质感，突然理解了‘护旗’不仅是动作，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舞台上的旗帜超越了道具功能，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图腾，将时空对话的最终落脚点聚焦在“红色基因代代传”上，引起观众共鸣。

（三）情感升维：从“集体叙事”到“个体精神光谱”的细腻书写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之初的舞蹈作品，受当时历史背景与宣传需求的影响，强调整体性与动员性，旨在通过舞蹈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凝聚抗日力量。在这一时期的舞蹈作品中，《黄河大合唱》以集体化的肢体律动模拟黄河奔腾的壮阔场景，通过“划桨”“怒吼”等标志性动作的重复强化，传递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大刀进行曲》以整齐的“挥刀”“前进”队列动作，直接呼应战场杀敌的场景，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激发群众的战斗热情。当代舞蹈作品《旗帜》在传承集体叙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嵌入了个体情感的“微光谱”，使红色叙事更加细腻、生动。从抗战时期到当代语境，相关舞蹈作品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以独特方式弘扬了鲁艺精神，为抗战文艺及红色经典资源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当代舞蹈作品《旗帜》中，老战士角色“抚摸旗面时嘴唇的颤动”“跪地时膝盖的三次试探”等极具感染力的细节，均源自抗联老战士口述史中提炼出的动作转译，将历史的厚重感具象化为当代肢体语言；在当代军人“接旗”后的独舞段落，编导加入“凝视国旗时瞳孔的收缩”“吞咽口水的喉结运动”等微表情，通过舞者演绎再到舞蹈剧场的近距离观演，让观众捕捉到英雄作为普通人的情感波动；当两面旗帜最终融合为“光的旗帜”时，全体舞者的呼吸节奏从历史组的沉重喘息渐变为当代组的均匀律动，形成精神传

承的身体声学景观。作品《旗帜》对英雄身体细节的深度挖掘,推动了红色叙事从宏大叙事到具身传播的跨越。

三、延安鲁艺时期的红色底色:抗战舞蹈创作的核心特征

抗战舞蹈精神图谱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的舞蹈艺术为载体,梳理其蕴含的民族精神、时代情感与文化心理的象征性结构,聚焦舞蹈作品、动作语言及舞种形态中所承载的抗战精神内核,通过舞蹈艺术的表达,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背景下的集体意志、抗争信念与精神追求。作为在战火中构建了以“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为核心的创作精神体系,延安鲁艺时期抗战舞蹈创作特征可概括为三个维度。

(一) 扎根地域现实:以身体书写东北抗战的苦难与抗争

延安鲁艺舞蹈工作者深入东北抗联根据地、沦陷区农村,亲身感受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抗争,将真实的东北军民战斗生活场景转化为舞蹈叙事。1941年诞生的经典作品《冰原长征》,以东北冬季严寒的条件为背景,为观众呈现出一幅惨烈的行军图景。在零下40℃的恶劣条件下,抗联战士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当舞者们演绎“雪地匍匐”动作时,身体紧紧与冰冷的地面相贴,艰难地向前挪动,令观众切实感受到战士们在雪地前行的那份艰辛;当舞者们演绎“裹衣御寒”时,紧紧裹着破旧的衣裳,身体被冻得瑟瑟发抖,却依旧坚定向前,彰显战士顽强的意志品质;“相互搀扶”的画面表现出战友之间深厚的情谊,在困境之时他们相互扶持,携手抵御严寒与敌人。这些写实性动作,把抗联战士们在极端困境中艰难行军的悲壮景象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北大荒的呐喊》则将镜头聚焦于沦陷区百姓暗无天日的生活,舞者们以“枷锁拖行”的沉重、“土地跪拜”的悲怆、“集体怒吼”的激愤,用肢体语言向世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震撼人心。这些作

品摒弃抽象空洞的抒情方式,东北地域的特色元素与抗战的真实事件紧密结合,将东北广袤大地上的皑皑冰雪、肥沃黑土与特色民居化为“隐性主角”,让舞蹈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这些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历史的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出永不磨灭的精神回响。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了解了东北抗战的艰辛历程,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二) 建构革命符号:从生活动作到战斗语言的创造性转化

为凝聚抗日力量,使舞蹈更直接地服务于抗日宣传,舞蹈工作者深度挖掘革命实践的精神内核,提炼军事动作、劳动场景与民间舞蹈元素,创造出极具时代气息的革命舞蹈语汇,使之更加贴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军事动作的艺术化层面,《大刀进行曲》巧妙提炼“劈刀”“突刺”“盾牌防御”等实战动作,将这些原本用于战斗的动作进行了艺术加工,配合急促的鼓点,将战斗场景搬上舞台,形成“动作即武器”的视觉冲击,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与战斗意识;在劳动场景仪式化呈现中,《垦荒舞》将农民的“锄地”“播种”“收割”等动作进行了节奏化舞蹈重构,舞者以手捧麦穗集体跪拜的庄严姿态,既致敬土地,又传递“以劳动为武器对抗侵略”的决心。而在民间舞蹈元素革命性改造方面,舞蹈工作者大胆突破传统桎梏,将东北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创新为“行进步”,把“扭腰”转化为“挺胸昂首”的战斗姿态,将民间舞蹈的娱乐性巧妙转化为革命动员性。这种从生活到艺术,再从艺术到战斗的转化,使舞蹈成为跨越语言障碍、激发民族斗志的“无声动员令”。在抗日宣传的战场上,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践行艺术为人民:在田间地头搭建“流动的舞台”

延安鲁艺时期的舞蹈作品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高雅艺术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固有藩篱,将演出场地延伸至村口晒场、前沿阵

地与战地医院等军民生活的地方，真正做到了艺术与人民的紧密结合。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舞蹈工作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高举“舞蹈到前线去，到群众中去”的鲜明旗帜，创造了“广场舞蹈”“行进舞蹈”“互动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八路军驻地，《胜利花鼓》的铿锵鼓点响起时，舞蹈工作者热情邀请战士们加入击鼓队列，鼓槌起落间，军民共舞的热烈场景将战斗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过程中，舞蹈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演，而是成为军民之间沟通情感、增进团结的桥梁。战士们在紧张的战斗之余，通过参与舞蹈活动，缓解了压力，增强了凝聚力。而舞蹈工作者也通过与战士们的互动，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战士们的生活与情感，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独舞《回家》的表演直击群众心底的家国情怀。在日军的侵略下，许多家庭被迫分离，亲人们天各一方。作品以“母亲盼子归”的动人演绎，引发了群众内心的家国情怀共鸣，表演现场众多观众热血沸腾，很多人当场报名投身游击队伍。在临时木筏上为渔民表演《辽河船工号子》时，舞蹈工作者将划船动作与抗敌口号巧妙融合，隐喻水上运输队作为隐伏的抗战力量。这种“艺术即实践”的理念，让这一时期舞蹈作品不只是审美的载体，更是动员群众、汇聚民心的精神利器。通过在不同场景开展表演，舞蹈工作者把艺术的种子撒入军民的心中，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让舞蹈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四、在历史长路上续写红色身体史诗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红色文化始终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承载着无数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与奋斗历程。红色舞蹈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之一，将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式，激励当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奋勇前行。红色舞蹈不仅是对历史

的回顾，更是对现实的鼓舞，它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一）从《抗战舞》到《旗帜》的岁月回响

红色舞蹈的创作与传承，本质上是对红色精神的时代性诠释。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者不断挖掘新的题材，运用创新的编舞手法，使红色舞蹈在保留核心精神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窑洞中以《抗战舞》踏出“地域性现实叙事”的身体足迹，到当代舞台上《旗帜》通过“双旗帜意象”完成精神图腾的符号升级，这场永不停歇的“身体革命”始终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重塑着精神图谱的形态——既以“为人民而舞”的初心坚守着延安鲁艺时期“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的图谱内核，又通过编舞手法的更迭创新，将不同时代的审美诉求转化为身体话语的重构密码。正如舞台上那面从破损到光耀的旗帜，红色舞蹈的传承本质上是一场精神图谱在身体话语中不断解构和重构的创新实践，既深植历史基因，又始终以当下的身体脉搏回应着时代的精神叩问。红色舞蹈的传承恰似一场永不停歇的“身体革命”，它既始终坚守着“为人民而舞”的赤诚初心，又不断回应着每个时代独特的审美诉求。

（二）以身体为笔，绘就新篇章

当代舞蹈作品《旗帜》的创作实践表明，抗战舞蹈历史资源的当代转化，本质上是一场身体现象学的理论实践——只有将舞蹈工作者肢体视为历史记忆的存储介质、当代审美的表达载体、文化传播的交互界面，红色艺术传统才能突破时空阻隔，在当代社会完成精神图谱重构。这一转化过程形成的理论启示为当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说，《旗帜》作品的价值早已超越个案本身，成为抗战精神当代转化的方法论样本，它的创作实践表明：唯有让历史资源在当代身体实践中重新起舞，红色文化才能真正实现从记忆到基因的本质性跨越。因此，在未来的舞蹈创作中还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鲁艺精神背后的人性光辉，

不断创新红色舞蹈精神图谱的实践路径,以红色基因赋能舞蹈表达,筑牢民族精神传承根基。

(三) 突破时代隔阂,传递红色力量

当下,这种传承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让当代年轻人理解“战损红旗”的历史重量,如何让国际观众读懂“旗帜对话”中的中国隐喻;如何突破时代的隔阂,将那份红色信仰通过舞蹈的形式传递给年轻一代;《旗帜》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红色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将历史的“大叙事”转化为身体的“微语言”,让红色基因不仅流淌在校史里,更搏动在当代舞蹈工作的血脉中。“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生产论维度来看,艺术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决定了舞蹈作品的站位和高度。时代性不仅表现了舞蹈作品的时间特征,也展现出它所感应的历史方位与潮流。”^[3]舞蹈创作转化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社会实践,让鲁艺精神通过身体对话的再创造获得了时代生命力。

五、结语

从延安鲁艺时期抗战舞蹈《进军舞》《大刀舞》《兄妹开荒》等经典作品的奠基,再到《旗帜》等当代舞蹈作品的创新探索,抗战舞蹈的精神图谱始终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完成自我重构,使“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的精神内核突破历史语境限制,以更具感染力的当代形态与观众

产生情感共振。《旗帜》的实践表明:红色艺术的生命力既在于坚守扎根人民的精神纯粹性,也在于拥抱勇于创新的时代开放性,通过符号的现代化转译、时空的多维架构与情感的细腻表达,抗战精神得以挣脱历史语境的限制,以更具感染力的当代身体表达与观众产生共鸣。作为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鲁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中形成的文艺精神。鲁艺精神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文艺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鲁艺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4],其蕴含的“扎根人民、勇于创新、服务时代”的内核,不仅是历史的回音和余韵,更是当代红色艺术创作的引导标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拓展、实践模式的创新变革、人才培养的优化与传播体系的完善,编创者要以更加丰富多元的意识,促进红色历史图谱的当代转化,让历史与当下在身体对话中实现时空共通。

参考文献:

- [1]胡博.东北鲁艺时期舞蹈家及舞蹈艺术活动的历史价值[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2):10-16.
- [2]胡天虹,吴厚兴.沈阳音乐学院校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108.
- [3]张萍.百年来党的文艺思想与当代中国舞蹈艺术[J].人民论坛,2021(7):107-109.
- [4]李哲,辛德万.鲁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研究[J].乐府新声,2024(2):125-130.